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

世界各國大學
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國民比較教育學會主編

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

中華民國72年12月初版

著作者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發行人 楊 榮 川

發行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局版臺榮字第0598號
臺北市銅山街1~1號
電 話：3916542號
郵政劃撥：106895號

基本定價：4.89 元

印刷所 明 文 印 刷 廠

(本書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梁 序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創立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惟其開始籌備，則在創立之前又半年，距今恰約十年。當時創立動機之一，為「結合比較教育學者專家，進行團體研究，以研究成果提供政府從事教育改革與研擬教育計畫之參考。」本此旨趣，自創立以來，本會歷年均有年刊出版，以事先商訂之專題，邀約會員同仁，撰寫稿件。出版之專題年刊先後計有：「世界教育改革動向」、「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動向」、「世界中等教育改革動向」、「世界初等教育改革動向」、「世界師範教育改革動向」、「世界技術職業教育改革動向」等七種，均內容豐富、見解深入，頗得社會之重視。

本年度本會擬訂之研究專題為「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

梁 序
此一專題之選定，乃以我國現行大學入學聯考制度實施以來，各方詬病甚多，教育部雖已決定自明年度起，作較大幅度改進，值得吾人欽佩，惟任何改進，絕非一蹴可幾，必須不斷研究、檢討，始能有臻於盡善之一日。兼以

教育問題，世界各國所遭遇者，率多類似，其他國家對解決問題所採用之方法，對我應有其參考價值。專題選定後，本會除公開徵稿外，並積極約稿，至出版前共得稿件十九篇，均就本專題自不同角度與不同國家，蒐集最新資料，撰寫而成，所具學術及參考價值，自不待言。稿件徵集期間之聯繫工作及其後之編輯工作，本會總幹事楊深坑教授曾付出不少時間與心力，令人感動。本人謹代表本會對十九位撰稿人及楊總幹事表示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最後願說明者，大學入學制度之所以成為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乃由大學教育民主化而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均積極延長義務教育，普及中等教育，大學教育受其衝擊，自必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因此，任何教育問題，均可說是整體教育發展的結果。本會同仁過去十年來，已對世界各國各階段教育的發展動向予以研究，實可作為了解與研究本問題的輔助資料。茲屆本會籌備與創立十周年及本年度年刊出版之際，特綴數言，以為紀念。

梁 尚 勇 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壹、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

我國傳統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

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歷史之一頁

——統一招生與分區聯合招生

從大學理念的發展看入學制度

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之改革動向 目次

梁序

壹、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

我國傳統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	伍振鷺	一
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歷史之一頁——統一招生與分區聯合招生	王煥琛	一三
從大學理念的發展看入學制度	詹棟樑	四五

貳、世界各國大學入學制度的現況與改革動向

我國大學入學考試的改進	林清江	八一
美國大學入學制度	呂愛珍	八九
美國大學入學制度的現況與改革動向	謝文全	一〇九
加拿大大學入學制度	黃明章	一二九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入學申請及考試制度	楊瑩	一三七

叁、大學入學制度與其他相關問題研究

從人力需求論大學入學制度

——高級人力運用與大學招生人數、科系設置的規畫	蓋浙生	二七五
論高中課程與大學入學制度關係	黃政傑	三一
大學入學考試應由高中教師命題	詹棟樑	三二七

蘇俄高等教育機構的入學考試與教育機會均等的關係	王文科	一七三
從日本大學入學制度改革論我國應有的改進	徐南號	一八九
日本公立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改革動向	劉煥輝	二一五
韓國大學入學考試制度	金梁垣	二四五
新加坡大學入學制度	孫一塵	二五七

我國傳統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

伍振
族

我國從古至今，均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家；而在各級學校的教育中，大學教育又最受重視。在清末興辦新式的大學以前，我國固有的大學，自上古國學的大學，以至中古及其後的太學與國子監，其存在與發展已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此四千餘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政治情勢的變遷與時代精神的推移，我國傳統的大學，不僅在不同的階段或朝代有不同的名稱，並且其教育的設施亦每因時君的好尚或現實的情況各異而興革無常，渺有一致。自來研究中國教育史的，通論最多，斷代或分論亦不少，但選論某一階段教育中的一項設施，則較不多觀。暑假期間，中國比較教育學會年刊編者徵稿，並指定題目：「我國傳統大學入學制度的歷史發展」，固辭不獲；無已，揮汗屬筆，湊雜成文，大略分爲：一、上古時期，二、中古前期，三、中古中期，與四、中古後期四個階段，簡加撮述。自知脫漏繆誤必多，尚祈不吝是正。

壹、上古時期

中國教育史上所謂的上古時期，係指虞、夏、商、周四代而言；根據史籍的記載，我國此一時期

的教育，大致是正式教育萌芽於虞夏，而教育制度則建立於殷周。關於此一時期的教育設施，其最大特色，乃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所有學校均係官立；而大學即是其時的官學之一。唯此一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因「平王東遷，王官失守」，而有所改變；下面還要提到，此處暫不述及。

有關我國上古時期大學的設置，據古籍的記載，「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尚書大傳）唯大學的名稱，四代各有不同，小戴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鄭玄以為上庠、右學、東序、東膠，均是大學，即孟子所謂的「學則三代共之」的國「學」之一。但另據大戴記保傅編：「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孔廣森注：「……大學者，辟雍之中堂也；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東堂名東序，一曰東膠；……西堂曰瞽宗；……北堂曰上庠；……南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由此看來，成周學備四代，王朝大學有五：中央為辟雍、亦稱太學，東為東序或東膠，西為瞽宗，北為上庠，南為成均，為周學的正名。除此而外，周代諸侯亦設大學，名為泮宮，小戴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黃以周說，「諸侯建國必有學，唯大學用泮宮制，天子命之，然後立。」（禮書通故卷三十二）泮宮又名少學，以別於天子之學，不詳論。

上古大學的設置，如右所述，虞、夏、商、周四代各有不同，然其入學制度，則頗一致，均具有階級性。尚書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而大傳載：「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

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周傳）又：「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日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略說）由此看來，上古時期接受大學教育顯然僅限於貴族，即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始有此權利。不僅如此，同為貴族而身份不同，如嫡子與餘子，其入學年齡與在學的時間尚不一致；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均二十歲入大學，而餘子則十八歲入大學，並且冬至後四十五日出學，以便「傳農事」。

以上係就上古時期接受大學教育資格的一般情況而言，其入學資格有階級與身份的限制；但亦有少數的例外，即由鄉學（小學）選升進入國學（大學）的俊秀之士，王制：「（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之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士」入國學之後，「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這是殷商所施行的一種「貢士」制度。「貢士」制度本在於由各級學校論選人才之俊秀者，上於王（天子）任官而爵祿之，但在此一制度下，亦有少數鄉人（平民）得以升入大學接受大學教育，打破了大學教育完全由貴族壟斷的局面；也許人數不多，但意義卻十分重大。

到了東周，情況大為改變：由於「平王東遷，王官失守」的結果，官學廢而私學興。私人講學不

能不收學費，收學費便不能限制資格，這便是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的由來。孔子「有教無類」，打破了教育的階級性，在中國甚至人類的教育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種進步，具有時代的意義；而孔子之被後代尊崇，其理由即在此。

貳、中古前期

中國教育史上的中古時期特別長，自秦代統一中國至清朝中葉以前，均屬中古時期的範圍；爲了行文方便，分爲前期、中期與後期三個階級加以敘述。中古前期，起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中經兩漢、魏晉與南北朝，至隋文帝滅陳再度統一，前後約八百年。中古前期八百年間，大學教育最值得重視也最有價值的設施，即爲兩漢的太學。太學的設立，發於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董仲舒的對策；建元五年（元前一三六年）初置五經博士，至元朔五年（元前一二四年）始由「太常議予博士弟子，以厲賢才。」（漢書武帝紀）至此太學設立完成。初期太學學生的名額爲五十名，入學資格僅有年齡一項的限制，「太常擇氏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漢書儒林傳）顯與上古官學入學有身份的區別不同，富有平等的精神。正規名額以內的學生而外，太學尚有「得受業如弟子」的學生；「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同上）雖係以特殊身份入學，但選補極爲嚴格，如文翁爲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漢書循吏傳）而「山陽侯張當居爲太守，坐選弟子不以實免。」（漢書百官公卿表）然後來正規生的名額增多，而以特殊身份入學的學生又日益浮濫，大學教育至此已經變質，而太學亦非復初設之舊了。「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的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漢書儒林傳）又「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同上）至東漢「質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後漢書儒林傳）良爲惋惜。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學校衰廢；嗣曹丕篡漢，三國鼎立，不久司馬炎篡魏，統一中國，是爲魏晉時期。魏晉時期，教育極爲衰落；魏文帝一度在洛陽設太學，並規定「太學生非在太學肄業二年試通一經者，不得列名學籍」，但入學資格並無明文的规定，大概多沿東漢之舊；因入學資格較寬，故「列名學籍」從嚴。至齊王正始年間（公元二四〇—二四八年），大司農劉馥建議，凡二千石以上官員子弟年滿十五歲者，須一律遣送入學；原意本在提高學生程度，但實施的結果，「高門子弟恥非其倫」，反而「學者有名無實，設教而無功」。然由此亦可顯示，當時太學的入學規定，特殊身份的學生雖享受優待，但平民子弟並未被完全排斥。這種情形，到了西晉，乃大爲改變。晉武帝統一天下之初，即承魏制設太學，學生人數一度達七千人；咸寧二年（公元二七六年）以太學生徒衆多，更立國子學，簡稱國學，專收貴族子弟；至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又以國學猥雜，限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這是中國大學教育，自漢代的太學以後，由單軌制變爲雙軌制的開始；以後歷代多國子學與太學並立，而入學資格亦有身份的限制或區別。

西晉立國不久即亡，東晉偏安江左，初期無大學教育可言；淝水之戰以後，謝石請復興國學，孝武帝納其言，選公卿二千石子弟分入國子學與太學，平民子弟似無入學機會。其時北方諸胡亦有興辦大學教育的，其入學措施，據史籍所載：前趙劉曜立太學，擇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加以教授；後趙石勒立太學，選將佐子弟三百人爲生徒；前秦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通一經以上的爲太學生，並遣六卿以下子孫入學受業；前燕慕容廆置東庠祭酒，令世子率國胄受業；北燕馮跋建太學，置博士郎，選教一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三以上的；南涼秃髮烏孤置博士祭酒，以教胄子；西涼李嵩立泮宮，增高門學士四百人（以上分見十六國春秋、晉書、南北朝史）；絕大多數均帶有階級の意味。

進入南北朝時期，南朝的大學，除梁武帝時的五館學生不分貴賤外，其餘宋文帝所設的儒、玄、史、文四學與國子學，明帝所設的聰明觀（亦名東觀），及齊武帝設立的國學，學生入學均有身份的限制。至於北朝的大學，多沿西晉之舊，設國子學（一度名中書學）與太學，學生入學亦僅限於貴族子弟，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五年（公元四四四年）詔王公卿士子弟入太學，百工技巧騶卒子弟當習父兄舊業，階級意味極濃。北魏之後，便無可述。

叁、中古中期

自隋文帝統一天下，中經唐與兩宋至元世祖入主中原，在此約七百年間，爲中古中期，中古中期

的大學教育，奠基於隋，興盛於唐，而轉變於宋；其入學措施，各朝亦不盡相同。

隋代統一天下之後，一時學制頗為完備；大學教育於國子學及太學之外，另設四門學，專收平民子弟，雙軌制的色彩，更為明顯。隋亡唐興，大學教育設施，益見完備；國子監所隸的大學性質的學校，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與廣文館，另尚有隸屬於東宮的崇文館、及直隸門下省的弘文館。以上這些學校，除廣文館因設立時間短暫，可以略而不論外，其餘各校學生的入學資格，崇文館與弘文館僅限皇室近親、太子、太后與皇后近親，暨勳官三品以上的子孫，顯然屬於貴族學校；至於國子學、太學與四門學的學生入學資格，據唐書選舉志所載：「國子學生三百人，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三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四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恭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優異者為之。」平民子弟的入學機會，可說不多。唐朝大學教育雖然發達，但入學資格階級限制明顯，乃是其最大的缺陷。

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頹之後，大學教育於北宋時期又再度興盛並開始轉變；轉變的方向有二：一為書院的興起，使宋代以後大學教育的重心，由國學逐漸轉移至書院，一為科舉的盛行，終至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有關書院的教育設施，就其與本文有關的入學規定而言，以其非官學，故限制較少，相對的亦可說較富平民精神；唯以紀錄不多，不詳論。至於宋代官辦的大學教育，其學校有五：國子監、太學、四門學、辟雍與廣文館；就中又以太學最為重要。因為五學之中，四門學與廣文館設立的時間均甚短，可以不論；辟雍為太學的外舍，宜並併入太學討論；另國子監設立時間雖較太學為早，

然太學設立之後，國子監即逐漸太學化，最後甚至二者難以劃分了。以下即依據上述的情況，略述宋代大學的入學措施。

宋代開國之初，即設國子監（一度更名為國子學）——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國子生；平民沒有入學的機會。嗣以國子生常有不來監肄業的，因先後准無入監資格的應考人在國子監附讀。仁宗慶曆二年（公元一〇四二年）為整頓國子監，乃新設立四門學，准「八品以下庶人子弟」入學。然兩年之後，范仲淹又建議另設太學，其招生的對象，即是四門學的學生，因之太學遂取代了四門學。到神宗熙寧四年（公元一〇七一年），王安石變法，太學行三舍法，「其生員分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元豐二年（公元一〇七九年），新頒「學令」施行，規定更為詳盡，「生員入學，本貫若所在州給文據，試而後入；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續長編）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有系統建立大學的入學與考核制度。唯不久王氏罷相——三舍法亦名存實亡。其後，蔡京秉政，於徽宗元符二年（公元一〇九九年），天下皆行三舍法，各州每歲許員三人到太學，「元符二年初，令諸皆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外舍為生。」（宋史選舉志）到此，大學的入學制度益為完備，也更富平等精神。崇寧元年（公元一一〇二年），又定州縣學生三年選升之制，稱為貢生，「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亦置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同上）三年，各州貢生至，另建辟雍以處，為

太學外舍；遂罷試補，太學生皆由升貢。雖然如此，但三舍法的施行，亦有不公不實的情形，而爲人所詬病，如：「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又「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更有「凡有官人不入學而願試貢士者，……隨內外附貢士公試；……中選入上等者升差遣，兩等賜上舍出身。……」（以上均引見宋史選舉志）及南渡後，太學生又稱弟子員，其選補亦異於北宋，「紹興十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凡諸道住本州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三事以上罰，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充弟子員。」（同上）其時辟雍已廢，三舍法不行。南宋末年，又行混補與待補之法：「所謂混補，是科舉之後，落第舉人參加考試，合格的補入太學；所謂待補，乃取諸路、州、軍解試終場人數百分之六，補試爲太學弟子員。」（詳見宋史選舉志）至此太學已成爲落第應考人的收容所，而學校亦完全淪爲科舉的附庸了。

肆、中古後期

自元世祖入主中國，經明至清末與辦新教育，是中國教育史的中古末期。在此約六百年的期間，一方面由於兩次受異族的統治，一方面因爲科舉的盛行，不但大學教育難以與前此相提並論，而由大學的入學措施，更可顯示科舉對於教育的影響與支配力量；尤以明清兩代爲甚。

宋亡元興，蒙古人以異族入主中華，其大學教育設施，於階級性之外，更具種族的歧視。元代的大學有三，卽國子學、蒙古國子學與回國子學。後二者由其名稱，卽可知其入學資格，有種族的限